

人口、就业和 社会保障

《人口与经济》 创刊30周年纪念文集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A Collection of Papers Celebrat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1st Publication of
Population & Economics

童玉芬 杨河清/主编

方 志/副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人口、就业和 社会保障

人口和就业
和社会保障政策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2000
Surveys of the 1st Publication of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2000 2000
1 1



Springer

人口、就业和 社会保障

《人口与经济》 创刊30周年纪念文集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A Collection of Papers Celebrat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1st Publication of
Population & Economics

童玉芬 杨河清/主编
方 志/副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 人口与经济创刊 30 周年纪念文集 / 童玉芬主编.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068 - 2546 - 7

I. ①人… II. ①童… III. ①人口—中国—文集②就业—中国—文集③社会保障—中国—文集 IV.
①C924. 24 - 53②D669. 2 - 53③D632. 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3770 号

策划编辑 / 李建红

责任编辑 / 牧 人 高 雅 杨铠瑞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3A 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ptougao@126.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57.25

字 数 / 1260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158.00 元

编者前言

一、本书的缘起

本论文集的出版，缘于2010年10月23—24日一个重要的全国学术研讨会“纪念《人口与经济》创刊30周年及全国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学术会议”的召开。《人口与经济》创刊于1980年，是国内最早诞生的人口学刊物之一，自创刊以来，《人口与经济》一直坚持“学术为先”的办刊理念，追踪国内人口学以及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人口与经济》率先进入核心期刊行列，并在国内学术期刊影响因子排名中处于前列，深受读者的支持与欢迎，获得了学界的赞誉。2010年是《人口与经济》创刊30周年，而立之年，不可不有纪念活动。

《人口与经济》是一个学术期刊，学术是期刊的灵魂，学术传播则是期刊始终不变的职责与宗旨。作为一个学术期刊，纪念活动也必须体现学术的主旨。为了更好地达到纪念这个学术期刊30周年的效果，在召开纪念活动的同时，召开一个与期刊学术方向密切联系的学术研讨会，用学术研讨的方式来纪念学术期刊，这也算是纪念活动的一个创新吧。于是，2010年10月23—24日，“庆祝《人口与经济》创刊30周年暨全国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了。会议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劳动学会共同主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和人口经济研究所承办。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研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口学会、中国劳动学会三个主办单位的主要领导，有来自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与信息司、政策法规司、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以及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吉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等政府部门的领导，有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北京市人口学会、广东省人口学会、吉林省人口学会等学会的领导，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河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南京大学、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达55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18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人口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人口学刊》等十余个国内期刊、杂志社的领导和代表。中国人口学会前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原副会长北京大学张纯元教授、国务

院参事北京交通大学袁伦渠教授等 10 余位老一辈人口学家、劳动经济学家也出席了大会。

不仅如此，大会还收到了上百篇的参会论文，来自人口学界、劳动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相关研究领域的众多学者为大会提交了自己的宝贵的研究成果，并在会上对研究内容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讨论，而这些成果就是本书内容的最初来源。

二、本书的研究意义

人口问题在我国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2010 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末年，也是“十二五”规划即将启动的一年，在此背景下，人口问题作为一种最基本的问题，常常同各类经济社会政策密切联系。只有深刻理解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才能更好地分析与此相关联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问题。而在当下，研究好我国的人口发展与人口政策、人口流动及城市化发展、人口老龄化等复杂的人口方面的问题，才可以为政府科学地制定未来的经济、社会政策提供帮助。

就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在当前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国家鼓励提倡的“促进就业”的方案，是一个有待我们不断深化研究的问题。就业是同劳动力人口数量与质量密切联系的，结构性的劳动力供需严重失衡是就业领域需要解决的长期难题。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等社会群体的就业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外，人力资源开发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领域。

随着总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成为亟须研究解决的大问题。此外，社会保障方面的研究也成为当前社会研究方面的焦点和热点。不仅仅是养老保障方面，建设一个包含医疗、工伤、生育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众多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

有鉴于此，“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成为本书研究的三个重要的主题。三个主题实际上是指向一个巨大的命题，那就是“民生”。无论是人口问题，还是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都是“民生”问题，且都是与人们关系十分密切的，也是最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次的研讨可以说是一个针对民生问题的一个集中性的研究。本书选编的论文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民生性”。

“民生性”研究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本书研究的意义所在。但本书的特征，也即研究与出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此，除了“民生性”，“交互性”研究可以说是本书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的特征和意义了。

“交互性”研究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本书研究领域的交融性。人口、就业、社会保障，看似是不甚相关的三个主题，但事实上，这三个主题都是密切相关的，从研究领域来看，三个主题都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人口问题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劳动力数量、城市化发展进程等都是与就业问题相关联的，先前的人口政策影响着当下的就业情况，而当下的人口发展和人口政策无疑又会对未来的就业形势产生重要的根源性影响。此外，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无疑为加快完善的社会保障建设提出挑战。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就业和社会保

障更偏向于一种应用性研究，而人口学则偏向于理论研究，但无疑这三者的研究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另一方面，“交互性”研究还直接反映在研究的交叉性上。参加本书写作，以及先前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作者，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群体，一是国内的人口学界，另一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两个先前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研究群体平时很少有大规模密集交流互动的机会，正是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使得不同的两个学科领域的人群能够在一起就相同的研究主题进行交流与探讨，各自贡献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从对方的研究视角、方法等方面对自己研究的主题获得了拓展型的认识，并在会后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化。因此，学术研讨会上，大家一致对这种跨学科性的研讨做出很高的评价，并表示希望能在以后形成惯例加以坚持。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本书所收录的研究成果是一个“无偏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备受作者们关注的跨学科交流研究的实验。

综上，本书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对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的，相信本书的出版会对大家最为关注的“民生性”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价值，同时，以本书为起点，也可以更好地促进未来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三、关于本书的出版

“这本书一定要出版！”正是因为本书具有以上的一些意义和价值，为此，才会备受各界学者的关注和极大的支持。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曾经一度希望与国外出版集团合作，出版能够被国际检索的文集，但是在英文版论文收集过程中因为多种原因未能达到篇数要求，因此最终依然决定在国内正式出版，在这个过程中使得论文集的及时出版受到一定影响，在一年后的现在才得以与大家见面。

这本书的出版凝结了众多作者的心血。首先，这本书收录了众多作者的研究成果，正是因为有这些作者的支持和帮助，才会使先前的学术研讨会得以顺利召开，才会有本书的出现。行笔至此，编者脑海里还能回想到有不少作者在沟通中表现出来的对本书出版的殷切关注，同时，还能想象得出其中不少作者对自己的文章不断修改并精益求精的样子。另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郑冬冬同学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承载着很多学者和编者对《人口与经济》期刊的热爱和对本文集的期待，凝结着大家的共同心血和辛勤付出，我们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编者
2011.7

目 录

专题一 人口发展与政策

- 003 十字路口的中国人口：危机与挑战 / 穆光宗 张团
- 01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 / 吕红平
- 027 基于回汉家庭子女数差异检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 / 樊明 李晓庆 张善华
- 037 农村独生子女父母（50+）家庭的亲子关系 / 周长洪 刘颂 葛芳 刘佩丹
- 045 北京市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影响的思考 / 王静
- 051 人口老化忧虑症和放宽生育政策论可以休矣！ / 李小平
- 069 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应提上日程 / 马小红
- 077 我国未来中长期劳动力需求预测 / 齐明珠
- 085 首都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的思路、战略和政策探索 / 尹志刚
- 099 再论人类自身生产中两种生命的生产及其相互关系 / 陈明立
- 113 农村 80 后青年早育研究 / 仰和芝 赵玲玲
- 125 论生育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 湛中乐 谢珂璐
- 145 年龄堆积问题的人类学考察 / 王海霞
- 151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再思考 / 郑冬冬
- 159 基于人口承载力的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 洪业应
- 165 高校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必要性与经验 / 徐江
- 171 河北省老年残疾人口规模和结构预测 / 王曼 李翰炜
- 179 省域人口抚养比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 张怀宇 王立波 梁信
- 189 我国青少年未婚人流问题的理论思考 / 茅倬彦
- 197 从收入构成角度解析城市居民收入差距 / 庞清静 赵威
- 203 我国老年人死亡年龄分析 / 杨慧
- 211 我国部分地区生肖偏好及其影响分析 / 卜雯婷

专题二 人口城市化与迁移流动

- 217 我国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状况分析 / 段成荣 马学阳
- 235 发展低碳经济 促进绿色就业 / 吕学静
- 247 现代化时期中国国际移民新特点与对策研究 / 胡伟略
- 251 专业性别隔离与女大学生就业 / 胡永远 曾胜男
- 259 美国的人口增长、分布与城市化 / 李仲生

- 269 论农民工的历史贡献 / 肖万春
- 277 流动在边缘：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的问题与社会工作介入 / 吕新萍
- 283 京津冀区域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 / 张呈琮 张健
- 289 人口—经济—环境系统耦合时序规律分析 / 肖周燕
- 297 苏州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村民社会经济状况变迁 / 范凌云 王德
- 305 农民工健康研究：认知—信念—行为的新视角 / 刘平青 隋华杰 屈金照
- 317 大连市区域资源承载人口压力测算及评价 / 王志刚
- 323 实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区域“一盘棋”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 苏德媛
- 329 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及其对策 / 李敏

专题三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 337 中国城镇社会保险反再分配问题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 杨河清 孟续铎
- 349 北京市老年人晚年的健康意识和实践 / 周云
- 359 社会变迁与出生性别比拐点来临 / 陈友华
- 365 主观贫困对农村老年人健康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陕西省的数据（摘要版）
/ 韦艳 史思
- 371 老龄化背景下的照护服务型居家养老模式研究 / 李新伟 赵立新
- 379 困境破解：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的难题 / 刘金祥 韩晔
- 389 中国社会保障财政制度特征与公共福利财政制度框架建设 / 刘继同
- 417 城乡居民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途径探析 / 杨来胜
- 423 经济较发达地区城市老人生存状况及居住意愿调查分析 / 杨春
- 43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运行效果的 LOGISTIC 模型分析 / 姜百臣 马少华 陈云
- 441 以城市化的角度看北京人口发展 / 韩茜
- 451 中国老年残疾人基本状况及社会保障模式选择 / 张金峰 孙端
- 457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聚类分析 / 谭姝琳
- 463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后果分析及对策探讨 / 谷龙飞
- 471 基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国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 邓波 陈利
- 477 浅析弹性福利制度的实施与员工激励 / 杨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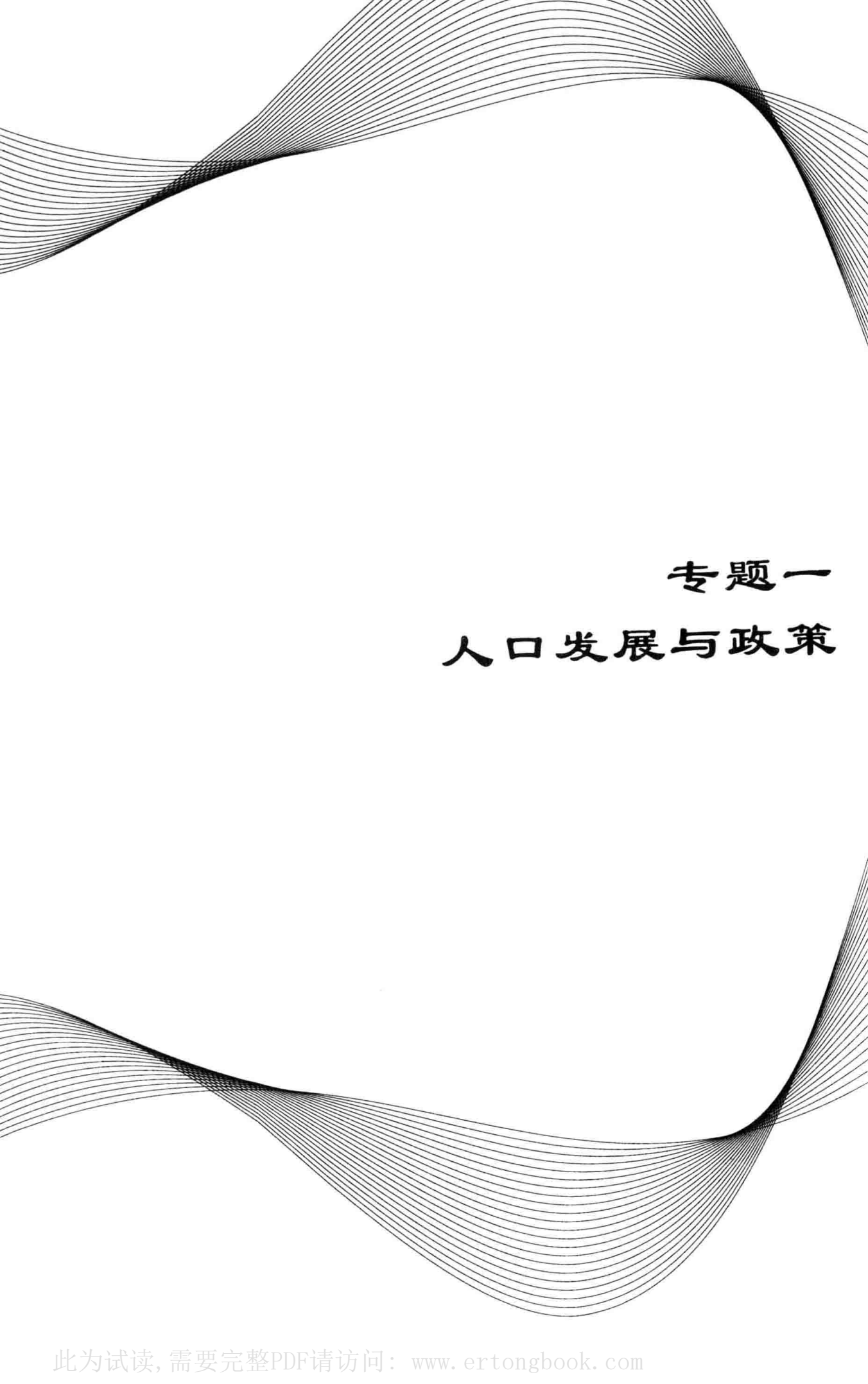
专题四 就业与劳动力市场

- 489 民工荒：是刘易斯拐点还是伊斯特林人口波谷？ / 翟振武 杨凡
- 503 外资企业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研究 / 冯喜良
- 509 未来 20 年中国分城乡劳动力资源供给趋势预测 / 童玉芬 郑冬冬
- 517 中国未来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趋势及特点分析 / 王金营 顾瑶
- 535 当前我国第二产业就业态势及其应对策略 / 谢茂拾
- 549 辽宁省城乡人口就业现状与对策 / 罗元文 刘振学
- 557 就业约束效应与中国产业升级战略选择 / 田洪川 石美遐
- 563 劳动经济学发展前沿理论综述 / 黎煦
- 571 我国就业服务问题分析及整合建议 / 段兴民 张守刚 杨蕾

- 579 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与刘易斯转折点 / 章铮
- 589 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管理问题研究 / 陈红
- 605 中国劳动力增长与经济发展 / 马寿海
- 611 2009 年中国劳动力和就业问题研究综述 / 郭琳 车士义
- 619 从人力与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看农民工小规模创业的倾向与动因 / 任锋
- 629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保留工资决定 / 田永坡
- 639 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工资趋同的经济学分析 / 吴克明
- 649 失地农民人力资本与就业关系的研究 / 王轶 谢辉
- 669 对我国现阶段就业形势的认识问题 / 张丽宾
- 683 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的构建：从分割到融合 / 廖娟 赖德胜
- 689 基于搜寻模型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一种解释 / 刘安禹 白雪梅
- 699 我国过度劳动评定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 王丹
- 709 经济低碳化背景下的就业促进研究 / 谭永生
- 715 北京“蚁族”收入状况及教育因素影响作用分析 / 秦婷婷
- 721 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吸引力分析 / 李春玲 卢思峰
- 729 再论北京市流动人口留京意愿的影响因素 / 胡丽莹
- 739 网络时代残疾人就业新路径探索 / 梁土坤 尚珂
- 745 中国高校辅导员激励机制探究 / 杨曦
- 757 非正规就业及其女性化的成因分析 / 袁霓

专题五 人力资源开发

- 765 我国小企业劳动关系问题研究 / 苏海南 胡宗万
- 771 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发展策略 / 李中斌 徐东芳
- 779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人力资源开发效应分析 / 王兴化 王晶
- 785 我国人力资源科技张力的思考 / 鹿立
- 795 发展中大国人力资本综合优势与经济增长 / 刘智勇
- 809 英国市场经济早期工人人力资本“公地悲剧”的产权经济学分析
/ 于桂兰 秦晓利
- 819 我国残疾儿童和青少年教育培训研究 / 吴江
- 833 我国老年居民慢性病患者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 和红 李宝生
- 841 农村人才管理体系与人才工作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 陈小平
- 849 制造型企业员工极端事件原因分析与应对策略研究 / 苏琴 杜秋永 牛雄鹰
- 855 我国教育性别差异的宏观、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 牛建林 齐亚强
- 871 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虚拟化探讨 / 牛全伟 宋恺 牛雄鹰
- 881 我国教师工资水平在地区间的应有差异 / 付尧
- 887 网络阅读影响下学术期刊的编辑策略研究 / 方志
- 897 人口学期刊的“马太效应” / 侯佳伟 黄四林 张银锋 刘宸



专题一 人口发展与政策

十字路口的中国人口：危机与挑战

穆光宗 张 团

一、引言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称《公开信》)发布,中国由此进入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急刹车”时代。《公开信》的发布成为我国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纪念《公开信》,既要肯定成绩,也要汲取教训。温故而知新,回顾为展望,历史无法假设也不能重来,但未来可以选择也可以创造。历史虽有无奈,未来却有希望。

放置特定的历史坐标,可以看到《公开信》发表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的历史情境大不相同,无论是体制背景、意识形态还是人口理论都不能相提并论。《公开信》不是简单的号召和提倡,而是号令与执行,叙述温和,实则刚强,是一封带有特殊意义的公开信。就《公开信》所提倡的“一胎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言,视野放宽到了20年,社会目标是四个现代化,人口目标是控制在12亿以内,人口经济目标是实现人均GDP800美元。问题的视野则放宽到了40年,如预见2020年可能出现人口老龄化。

应该承认,《公开信》中的一些价值取向至今仍有意义,如信中谈到三十年后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克服重男轻女,尊敬、爱护和供养老人,适当强调晚婚晚育,要照顾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有困难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节育方法由群众自愿选择,杜绝强迫命令,等等。《公开信》之后,我们在减缓人口增长压力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也有三个历史的结论和启迪:第一,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而是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我国的人口问题早已从单一的人口增长问题转变为集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流迁为一体的复合人口问题。第二,单一的人口控制不足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生育率也不是越低越好。当初,人口问题被理解为人口增长问题。第三,人口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经济发展和妇女发展和社会参与也是降低生育率的重要力量,也是缓解人口压力的重要机制。人口的行政控制只是促使生育率快速下降直接的政府力量。

任何一个政策都是历史的产物,也有历史的终期。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下称《稳定低生育水平决定》),《稳定低生育水平决定》的问世实际上已经标志我国的人口发展开始淡出人口控制为中心的思路。其时,我国政府意识到生育率继续下降的任务已经完成,全国上下需要警惕的是来之不易的生育率的反弹问题。2006年12

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下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决定》），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新的命题提出标志着后《公开信》时代的真正到来。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多、挑战更大、任务更艰巨，对人口问题、人口规律和人口工作的认识再次被刷新。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

纪念《公开信》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好的理念和经验要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则要总结历史的教训，尽量减少人口发展的代价和风险，走一条人口长期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道路。为此，我国需要在后《公开信》时代在科学人口观的指引下努力打造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价值—政策—制度体系。

二、《公开信》出台的历史背景和实施成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刚刚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全民族都怀着极其强烈的脱贫致富、振兴中华的渴望。现代化的航道正在令人兴奋地拓展，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中国最大的一个国情——这就是人口多、底子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一胎化”政策的出台是以当时的认识为基础的，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和人口理论界对国情进行估计的产物。1979年，“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就已经开始酝酿。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正式宣布调整70年代以来“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指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其后不久，著名的《公开信》发表，标志着中国特色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执行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十分讲政治的社会环境中起到了巨大的示范引领作用。

《公开信》以信的独特形式宣告了中央政府的决心和信心，这封信基本上框定了现行生育政策的基本内容，这就是：①反复强调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②某些确有实际困难的群众，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不能生三个孩子；③少数民族的生育可适当放宽。特别应当指出，这里的“提倡”实际上只是一种宣传用语，新生育政策的核心就是“一胎化”，所以可简称为独生子女政策。

“一胎化”政策的出台大致有这么几方面的背景：

其一，体制背景。“一胎化”政策的出台受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宁“左”勿右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计划生育从一开始就烙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这一点非常重要却常常被人所忽视。其实，《公开信》只是一个动员和发动，之前国家的决心已下，舆论已起。例如，1978年10月中央批转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各地根据人口规划的需要，对生得晚一点、稀一些，可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具体安排。”对于晚婚年龄，该报告提出“农村提倡女23岁，男25岁结婚，城市略高于农村”。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提法。计划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下达计划指标。1979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过全国计生办主任会议，已经明确提出：“今后要提倡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间隔三年以上；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三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在实际中，山东荣成等地已经提出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口号，“只生一个”被视为政治上先进的表现。

其二，政治背景。邓小平作为一个大有作为的政治家，他的务实精神和宏大追求使得他的政治目标非常实际和明确，这就是他复出之后并不是当官就完事了，而是想做点事——始终萦绕在他胸中的是如何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裕这样的大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官，另一种是做事，但是谁叫我是共产党员呢？所以我的态度是做点事。”话语朴实，但态度明确。他的抱负必须通过经济发展来体现，而当时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人口太多、增长过快，他看到了人口因素对现代化步伐的阻滞作用。譬如，1980年9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萨拉斯一行时谈到：“我们制定了控制人口的计划，争取到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的经济不能很好地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提高。”

其三，经济背景。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心理，那么“民心思定，民心思富”八个字也许就足以概括。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太穷了，绝对贫困人口估计有2亿多，虽然建国已经30年，但由于政治运动频繁，经济发展一波三折，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相反，绝大多数人还相当贫困。就业上的压力也非常之大，而僵化的经济体制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却极为有限。一方面，城镇每年有700万~800万新增的就业人口；另一方面，农村有上亿的剩余劳动力，而且新生人口还在不断增长。经济不发展，一切都谈不上。10亿人口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来说实在是压力太大了，经济实力和人口压力形成了巨大反差。

其四，历史背景。20世纪初叶特别是在建国以后，在学术理论界和政府领导人中，避孕节育的必要性逐渐达成共识并形成氛围。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者陈长衡的《中国人口论》、《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陈达《人口问题》、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人口论纲要》等发表了人口节制的主张。陈长衡提出“一个儿子提心吊胆；两个儿子，锦上添花；三个儿子，到老变成四家；多男多女多冤家，无男无女赛仙家。”陈达先生提出的“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一直是人口理论界的中心议题。陈达先生建国后提出：“节育无论对家庭生活、对国家建设以至整个民族的健康和兴旺，都有莫大的好处。”但他不赞成绝育和堕胎，而主张主要依靠晚婚。

1953年政务院批准了中央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和人工流产办法，指示卫生部帮助群众做好节育工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提倡过避孕节育和计划生育。1956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1957年10月，毛泽

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其五，人口背景。当时中国即将面临第三次生育高峰的冲击，为了平抑增长型人口年龄结构所产生的生育惯性，实施“一胎化”就被一些学者和决策者看做是最必要的一种选择。当时普遍存在着一种人口增长危机论，认为在10亿人口的基础上再迅速增加人口，无异于在亲手葬送现代化的一切成果。影响至今的主流观点认为，新增人口每年都要“消费”掉相当比例的国民收入，这影响了生产积累。人口增长巨大的分母效应需要通过严格的生育控制加以遏制。

其六，学科背景。其时中国人口学刚刚恢复，还处在重建阶段，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有较多的局限。根据田雪原研究员在《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的回顾，1980年3~5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就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是否可行，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等展开讨论。当时关心的问题是：①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孩子智商和智能下降。②提倡一孩多长时间为宜。田雪原提出应该理解为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既非长久之计，也非权宜之计。③四二一结构问题。认为是部分现象，取决于政策的把握。由此可见，风险问题、成本问题和代价问题（矛盾冲突）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

其七，国际背景。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强国。中国之大，主要体现在人口众多和地理广大上，但从人均占有的资源、产值和收入来说，中国又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都将取决于综合国力的提升程度，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国虽然早在1949年就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长期以来由于经济上不能强大起来，所以政治上的影响力也深受制约。人口问题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

总之，国内外的种种情形都证明一点：中国只有尽快富强起来，才可能使诸多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迎刃而解。而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的过程中，人口控制问题是必须认真考虑的战略性问题。

独生子女政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一个基本国策，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具体来看，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遏止了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相对减缓了人口增长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脆弱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压力。据估算，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按70年代生育水平推计，中国已经少生了大约3亿~4亿人口。有人认为，人口控制的这一成就不仅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争取了时间和空间，而且为早日稳定全球人口作出了贡献。

其次，促进了妇女的解放和妇女素质的提高。计划生育使大多数育龄妇女从过去多生密育的繁重劳动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由于女性的解放，所以，中国妇

女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即在家庭、社区以及社会中获得和控制资源、权力和威望的能力在不断提高。妇女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充实和完善自己，计划生育拓展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空间”和“成就空间”，这给她们素质的提高提供了帮助。

再次，促进了生育质量的改善。一般少生可以促进优生，我们所观察到的许多事实也正是如此。最突出的就是：在独生子女家庭，一般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更高，更乐意、更有条件进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孩子少使得家庭的经济负担也相对要轻，“少生”的确可以为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创造更优越的培育孩子的条件。许多研究已经证实，独生子女新生代比多子女家庭出来的孩子平均的智力发展水平更高。

第四，有利于农民群众的脱贫致富。独生子女家庭和双女户家庭一般更能得到来自基层组织的照顾和帮助，在这个意义上，“政策型生育”可以为农民群众的脱贫致富间接地创造一些条件。特别是“抓好计划生育”的口号提出之后，中国的计划生育道路逐渐走上了一条“以育龄人群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效果日见显著。“三结合”^{*}的做法已经并将继续展现这样的效果。此外，由于“少生”使农民在时间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家庭配置上余地更大，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机会成本的增大同时也使少生的潜在优势得到了发挥。

三、中国人口发展的六十年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我们可以从人口增长、人口控制和人口问题三个角度来看中国人口发展的历程。

第一个角度是从人口增长看人口发展，根据人口转变理论，我们大致可以将1949年到现在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基本上是20年一个变化：

第一阶段是人口高速增长阶段（建国初到1973年）。人口增长变动要看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三个变量的组合特征。这一阶段人口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出生率居高不下（多数年份在30‰以上），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从20‰下降到7‰，50年代下降10个百分点），自然增长率高（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0‰以上，最高年份是1963年，达到33.33‰），人口增长较快。人口转变开始，出现人口转变增长（所谓“人口爆炸”，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但并不科学），与20世纪50年代之后世界人口发展遵循了相似的轨迹，马寅初先生就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年代。50年代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提出人口控制、计划生育主张，70年代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提出“人口零增长目标”。

第二阶段是人口减速增长阶段（1974—1990年）。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高水平的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了，死亡率继续有所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开始下降。1974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20‰以下，之后的年份出现了连续、稳定的下降趋势。1974年这一年也是全国范围里普遍提倡和开展计划生育的特殊年份。根据《公开信》的说法，1971年到1979年，我国努力控制人口增长9年，累计少生婴儿5600万。

第三阶段是人口低速增长阶段（1991年到现在）。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低出

^{*} “三结合”是指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与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简称“三结合”。